



青年毛泽东之路：沪上打工日

当“驱张”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带着“湘事善后”的问题奔赴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丰富多彩,送别会友、工读互助、写稿投稿、“设计”湖南、拜访名人……在上海一呆两个多月。毛泽东在半淞园送别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时,说出了 一个要害问题:“发动驱张运动时,我们就遭到了多次迫害,被迫离乡背井跑到上海、北京来了。”

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滞留上海,也不管他在上海另有什么收获,但比起他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承担了回湖南建党任务,其他一切并不重要了。

足迹： 上海,第3次沪上行

毛泽东第三次去上海,到达的时间是1920年5月5日。

时隔一年多,与第一次来上海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需要做的事情也更加多了。

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时,他就一个目标,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到达上海的日子是1919年3月14日、17日、31日,他、萧三和环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朱少屏、华法教育会会计吴玉章,到杨树浦轮船码头为赴法者送别。

第二次赴上海,是1919年12月中旬,他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这是第三次来上海了。与前两次一样,起点也是北京。这次,他可体会到了“行路难”:他要到上海,却“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他“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他,使他 能买到浦口。他后来回忆说:“不

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他还给同乡、老师黎锦熙写信诉苦说:“京别以来,25天才到上海。”

这次到上海,毛泽东的目的有三:一是虽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可他终究没有走,还得再烧一把火;

二是既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那么这之后的湖南向何处去?他要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湘籍名绅商量。后来,他们果然组织了湖南改造促进会,由彭璜任会长。

三是他要为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萧子璋(三)等6人送行。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一住两个多月。足印:半淞园,送别“新民”会友

足印： 民厚里,做了一段洗衣工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两个月就一直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这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大门为普通的排门,底层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左侧为小天井。店堂与灶间之间是楼梯。顺梯而上,前楼是宽敞明亮的正房,房外有一个小阳台,后楼为一小亭子间,上有晒台,有尖头木栅栏与邻居相隔。

据李思安回忆,毛泽东到上海以前,这个房子是她出面租赁的,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她还回忆说,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床头有一张方



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

形茶几,上面堆放着各种报刊。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不久,她也搬了进来,住在灶间。楼下店堂不住人,供吃饭和会客、开会之用。靠近楼梯的地方,有一圆形柴炭风炉,炭篓放在楼梯底下。所有家具,都是东租西借凑合起来的。

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和艰苦,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

生活难以为继,解决得靠自己——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参加的项目是为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诉说自己工读生活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足音：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等重大问题。在陈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转变。后来,他在与斯诺交谈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

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李思安回忆,在回湖南前,他们“告别时,陈独秀再次肯定:你们的计划如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彭璜激动地说:我们也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在你的指导下,再着手建立“共产党”,今后还有许多事要你指导。陈独秀点点头,说:“多联系。”这就是说,湖南列入了陈独秀的组党计划。

毛泽东、彭璜、李思安还去拜访了“很提倡国际主义的”吴先生——中文名吴廷康——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后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朗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可算作会见魏金斯基成果之一。

1920年6月,张敬尧逃离湖南。毛泽东也于7月返回湖南长沙。

(节选自《湖南日报》)

上海秘密电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秋收起义之后建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中。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保持内外联系,加强革命指导,就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高瞻远瞩,下定决心,亲自过问和部署秘密电讯的建设工作,使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

1928年秋,党中央为了冲破敌人封锁,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红色区域的领导和联系,开始了秘密电台的筹建工作。1928年10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学习电台机务,可想而知会遇到很多困难。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在那里购

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

张沈川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值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他在值班时还收到广西第四军用电台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内容是李明瑞师长要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拨给购运书籍款3000元,交给张沈川(张沈川和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时广西方面正在酝酿反蒋。张沈川取得现款后立即交给党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刊运往广西。不久,受过特务训练的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3个学生被派来实习,当他们在检查前两个月的收发报底稿时,发现了这份明码电报,立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台长“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于是台长被撤职。张沈川由于事前离开了电台,没有惹上麻烦。此后,他隐蔽了起来,与李强一面学习组装收发报机,一面抄收公开电报,提高收报技能。

张沈川、李强等人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可以说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到1929年10月试制成功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而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则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

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当时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里。负责报务工作的是张沈川,黄尚英在台上实习。电台的天线架设于三楼晒台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种伪装加以掩护。电台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这个台的建立,主要目的还是试验装置和练习通报。”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往往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在和别的业余台通报短暂时间后就把天线撤掉。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



电台的方位;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

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来人往,人员很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5月中旬,将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11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节选自《党史纵览》)